

文章编号: 1003 - 2053(2013)06 - 0801 - 06

再思科学知识社会学: 社会学经验研究的启示

吴肃然

(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 黑龙江哈尔滨 150001)

摘要:国内社会学界对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SK)的关注较少,哲学界的讨论则往往远离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实践,这一方面造成SSK研究与其他社会学研究领域的脱节,另一方面使得SSK的方法论价值未被全面认识。从社会学经验研究的角度看,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囿于“语义学神话”从而深深陷入形式主义误区,SSK研究者则敏锐地指出了这个病症。反科学、多重发现、虚无主义等观点均不是批评SSK的恰当理由,而SSK所遭遇的困境也不专属于其自身,它实际体现了现代西方认识论文化的根本困难。

关键词:科学知识社会学; 经验研究; 社会科学

中图分类号: C03

文献标识码: A

距离以“索卡尔诈文”为中心事件的科学大战已接近20年,对于这场大战中的被动方——“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SK)研究,中国学术界已有不少述评。它们大都集中在科学哲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领域,而在社会科学哲学、社会学理论、文化社会学等诸多领域中,SSK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除个别研究外,国内社会学界鲜见对SSK的介绍;相反,哲学界对于SSK的讨论又往往远离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实践,这就使得科学大战所蕴涵的西方现代主义认识论文化的内在困难未被人们充分认识。

1 SSK与社会学经验研究: 批评与反思

1.1 科学性问题的

著名哲学家马里奥·邦格总结了SSK的七个信条: 外在主义、建构主义、相对主义、实用主义、日常主义(ordinarism)、过时的心理主义和非科学/反科学的哲学观。邦格认为,持有这七种信条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根本不可能真正理解科学,他们的工作意味着科学社会学研究的严重倒退^[1]。邦格严厉批评了SSK所持的“非科学/反科学的哲学观”,这些哲学观包括“语言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法国符号学学派”。在邦格看来,此类哲学都是“胡扯、废话或谬

误(gibberish, platitudes or falsities)”^[2]。

许多自然科学研究者并不了解上述哲学思潮,因此如果我们将“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那么把上述哲学称为“非科学/反科学”的做法似能成立。然而,假如我们将目光转移到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中,邦格为此类哲学观打下的标签便会使人产生深深的疑惑。如果摒弃了“语言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法国符号学学派”,20世纪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最耀眼的大部分成果都将失去立足点,剩下能够符合邦格科学观的社会科学研究唯有统计主义的量化社会科学,而后者早已受到社会学研究者的广泛批判。费金(J. R. Feagin)等人在回顾美国社会学史时提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学界就一直存在着“论文社会学”(article sociology)与“著作社会学”(book sociology)的对立,“目前,主流的社会学期刊注重使用假设-检验的实证主义框架来解释定量统计数据。大量主流期刊中的社会学家依赖于政府和基金会的支持,他们大多使用来自于官方的人口数据或其他调查数据,这就使得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和批判性都受到了限制”。费金等人猛烈批评了“论文社会学”:“绝大多数主流期刊上刊登的社会学文章都无关于我们对社会的深入理解”,这种“持久的无关痛痒”(persisting irrelevance)导致了“主流期刊社会学的

收稿日期: 2013-01-08; 修回日期: 2013-04-11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HIT. HSS. 201219)

作者简介: 吴肃然(1979-),男,安徽蚌埠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社会学哲学、社会理论。

悲剧”^[3]。

1.2 “多重发现”现象

除邦格的意见外,其他一些学者对于 SSK 的批评也不够清晰。著名科学社会学家科尔说道“我的工作使我强烈地拒斥这样的结论:自然科学是完全社会建构的。但我在社会科学方面的人生经历使我更倾向于这种可能性:社会科学可能确实是完全社会建构的”^[4]。这种观点同样会给读者带来困扰:既然社会科学完全是社会建构的,那么默顿和科尔等人所从事的“科学社会学”是否属于这种社会科学呢?想来传统科学社会学家不会承认自己是建构主义者,他们不会承认自己的研究结论存在着客观性问题。实际上,科尔等人在讨论认识论问题时主张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二分,在讨论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时却常常回归一元论的科学观,这里存在着令人费解的矛盾。

在批评 SSK 时科尔还援引了其他理由“对于社会建构主义者的观点来说,多重发现的存在也提出了问题……如果科学发现的内容是某种特殊情况的偶然结果,那么又如何解释不同的科学家在非常不同的情况下工作,却经常得出了同样的科学发现?多重发现的意味就是:发现不是社会性地建构出来的,而是必然的”^[5]。在科尔看来,多重发现意味着客观自然的存在,只有从符合论的角度来理解科学研究,人们才能对“多重发现”予以理性解释,因此“建构主义”的思路是站不住脚的。然而如果对 20 世纪以来的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有所了解,我们便可以发现一个悖论性的事实:建构主义自身就是一个“多重发现”。我们很难在法国结构主义与英国科学知识社会学之间找到确切的思想史联系,然而熟知两种研究理路的研究者很难否认它们之间观点的相似性。迄今为止,人们并没有发现弗莱克与后期维特根斯坦之间存在着思想传承,然而为何二者的知识社会学观点如此接近?国内著名社会学家谢立中曾提出“多元话语分析”与“后社会学”的概念,后来他在一篇论文中写道“为了帮助理解‘后社会学’的不同可能性,我们提供了两个‘后社会学’的范例。一个是笔者近年来倡导的‘多元话语分析’,另一个则是萨默斯(M. R. Somers)、休厄尔(W. H. Sewell)、洛克曼(Z. Lockman)等人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倡导的‘后社会史’。虽然这两个研究范例分别属于不同的研究领域,具有不同的研究兴趣,并且是由不同的人先后在不同的时间、空间范围内相

对独立地构想出来的,但仔细阅读过相关文献的读者都很容易发现,这两个研究框架在基本理念方面具有高度的相通之处”^[6]。由此可见,从认识论角度来说,多重发现的理由是不足以驳倒建构主义的,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理应进行更为艰深的思考和讨论,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批评者们往往有些想当然。

1.3 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是对 SSK 的另一个主要批评,然而不少批评者并不了解“虚无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位置和色彩。社会学的奠基人马克斯·韦伯提出了研究方法的“价值中立”原则,强调事实与价值的分野:社会科学研究者在选择问题时带入了价值,但是在对问题进行因果分析时,研究者必须持一种价值中立的态度。“价值中立”原则为许多社会科学家所接受,但是美国政治哲学巨擘列奥·施特劳斯在名著《自然权利与历史》中对其提出了批评。施特劳斯认为,“韦伯关于社会科学的范围和功能的观念,是以这样一种号称可证明的前提——亦即,终极价值之间的冲突不可能由人类理性加以解决——为基础的”,而这一前提则是未被证明的,它本身或许只体现了“某种特殊的道德偏好”。施特劳斯指出,当代社会科学深受自由主义文化的影响,试图把人连根拔起,然后再借助虚无主义来重建政治社会的伦理基础和社会科学的认识基础,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性发展得越高,虚无主义也就发展得越深”。基于对自由主义、现代性及后现代性的批判,施特劳斯提出了回溯自然正义的办法,试图找到独立于历史流变的“对错”标准与“善恶”标准^[7]。

施特劳斯学派对当代社会科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与德国著名思想家卡尔·施密特都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虚无主义”予以强烈拒斥,二人之间的理论共鸣被称为“隐匿的对话”。国际社会科学界兴起了长时间的施特劳斯热和施密特热,中国亦不例外。然而,对于施特劳斯等人提供的疗救虚无主义的方案,不少知名学者都持负面态度。他们既从相对主义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出发来反思施特劳斯的绝对主义观念,也直指施特劳斯主义对于当代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影响,以及他为消除虚无主义所提出的基督教主义方案^[8-10]。

由此可见,虚无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负面词汇,许多学者在批评 SSK 之时并没有进入社会研究的问题域,未能体察到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微妙关系,不了解布

鲁尔等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在人类学领域中的创见,更不用说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来说极为重要的尼采传统,以及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中伦理学和认识论的联结。

1.4 学科目的

SSK 研究也被批评为缺少后见之明,“哲学观点是并不需要经验证明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的做法,恰恰堵塞了提出经验研究课题的道路”^[11],“这些热情洋溢的研究除了论证了一些常识观念外,还留下些什么呢”^[11]? 上述质疑均指向同一个问题,即社会科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批评者们没有认真讨论这个问题,而诸多社会学家在此问题上进行过大量的反思与讨论。英国社会学家贝尔特说道:“对自然主义者来说,知识的目的是去解释及预测外部世界;对绘图师而言,知识就是去描绘该领域。这两种策略都没有反思到知识可能具有其他形式,或者,更正确的说,这两种策略都没有反思到社会研究可以追求其他目的。这些目的之一,便是我所谓的自我知识——即人们具有质疑或重新描述自身及其文化预设的能力”,“自我指涉的知识形式将使人们能论述自身文化里不曾受质疑的部分,能挑战文化的深层信念,并能想象另类社会政治方案而非接受现行方案”^[12]。从贝尔特的观点来看,到底是科学知识社会学还是默顿科学社会学才更加符合社会科学的学科目的呢? 外界的批评者未曾了解到,在社会学领域中被视为意识形态吹鼓手的,往往不是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学家,恰恰是那些传统范式下的研究者。这种现象早已为福柯与哈贝马斯等著名思想家所揭示。

从前面的论述能够看到,在社会科学研究的视野中,SSK 所遭遇的许多批评都是有待商榷的,不仅如此,如果我们对社会学史有比较清楚的了解,SSK 的积极意义将会更加凸显。

2 社会学方法论争论与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的洞见

2.1 社会学方法论的二元对立

社会学自诞生伊始便伴随着大量的方法论争论。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奠基人涂尔干强调要将社会事实视为“物”来研究:自然科学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它揭示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因此,社会科学家也就必须“把社会事实视为物”,他们需要学习

“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在他们的学科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时所具有的那种精神状态”^[13]。实证主义社会学家们“强调科学是建立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的,通过归纳建立普遍性的命题,找出现象间的规律,从而有可能对同类现象的再次出现作出预言,并对所建立的普遍命题是否有效进行证实”^[14]。

将社会现象等同于自然现象来研究,这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最重要假设。这个假设遭到了其他学者的反对,以德国历史学派为代表:兰克等人认为人文现象本质上不同于自然现象,它没有普遍的规律性可寻。狄尔泰继承了历史主义的上述观点,提出了“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en)与“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的区分。“精神世界不是直接可以观察到的世界,并且它也不受制于普遍而必然的自然法则,因而精神科学的方法就不能单纯是观察、实验和按普遍规则进行推论,而应是一种内在的体验,这种内在的体验使我们通过自身内部的经验去认识他人精神客观化物里的他人精神”^[15],这种方法就是“理解”(verstehen)而非“说明”(erklären)。

实证主义与解释社会学的对立通过涂尔干和韦伯的工作为社会学树立了两种研究传统,这已是社会学领域中的老生常谈。1961年,在图宾根举行的德国社会学大会上,波普发表了题为《社会科学的逻辑》的论文,批评德国历史主义传统中对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划分。这篇论文引来了一场长达十年的大论战,虽然应战方是批判理论取向的法兰克福学派,但论战的核心问题依然是狄尔泰和韦伯等人当年的关注所在。这场论战“其意义和影响远远超过了社会学一门学科的范围,对当代整个社会科学界都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16]。哈贝马斯在《科学的分析理论与辩证法》一文中回应批评了波普等人的后实证主义:第一,后实证主义没有区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差异,后者涉及价值判断;第二,后实证主义者过于天真的看待社会科学研究,忽视了工具理性背后的意识形态宰制^[17]。可以看到,哈贝马斯在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中一方面继承了德国历史主义的传统,一方面吸纳了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对主客二分的批判思考。

综观20世纪50、60年代社会科学界关于实证主义和诠释学的讨论,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1)人们大都认可实证主义是有效的自然科学研究范式;(2)实证主义未能发展出其所期许的社会科

学研究成果,这构成了诠释学方法论发展的重要理由和动力;(3)两种方法论的核心分歧依旧,并没有因为认识论哲学的发展而减少或消失。实证主义者仍然坚持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采用与自然科学相同或近似的研究方法,而诠释学的支持者则继承了狄尔泰的科学二分,强调社会科学研究之于自然科学研究的本质区别;(4)语言哲学与理论物理的发展,给弥合上述分歧既带来了希望,也制造出新的困难。

积极地来看,这场方法论辩论也推动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进展。“理解”问题的深化激发了如哈贝马斯“沟通行动理论”的出现,给人们理解现代性问题带来崭新的视野。同时,温奇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规则论引入社会科学,启发了社会学家对于“实践”问题的关注,从而带来社会学理论中重要的“实践转向”。不过上述进展多发生在诠释社会学的领地中,对解决实证主义和诠释学的二元对立没有多少助益。哈贝马斯在《论社会科学的逻辑》一书中写道“科学的分析哲学和哲学诠释学各自为阵,最多在自家领地内进行一些自说自话的概念讨论。分析哲学派把诠释学派视为前科学的落后分子,诠释学派则反过来把形式科学看成一种对于世界的狭隘理解”^[18]。卡尔·波普则毫不留情地这样评价对手“从胡塞尔的本质主义到现代的生存主义的德国哲学发展已经误入歧途,它导致了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相当普遍地把康德和启蒙运动看作是完全过时的东西”^[19]。1959年英国学者C. P. 斯诺在剑桥以“两种文化”为题发表著名演讲,指出“整个西方的智力生活已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他们都荒谬地歪曲对方的形象。他们对待问题的态度全然不同,甚至在感情方面也难以找到很多共同的基础”^[20]。实证主义与解释社会学的对立,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印证了斯诺的判断。

2.2 社会科学经验研究的困境与SSK研究的价值

方法论上的二元对立在研究实践中体现为定量-定性、统计调查-个案研究、重演绎-重归纳、经验中心-理论中心等多种对立。目前国际社会科学界的定量研究大多仍沿袭逻辑经验主义的方法论思路,给当代社会科学造成了严重的形式主义问题。假设检验方法被滥用,研究者们常常混淆统计显著与实际意义显著,为了恪守所谓严谨的研究方法,人们制造了大量毫无新意的“实证”研究。许多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者秉持《逻辑哲学论》中的世界观,尝试将研究对象剥离为单个的原子事实,把大量时

间用于诸如“内生性问题”的讨论,社会科学研究者们深深陷入“语义学的神话”而不能自拔^[21]。

量化研究者们并非没有看到这种困难,他们常常会给出一些基于逻辑经验主义的补丁式解释,如强调理论的作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有差异的、社会科学研究要注意背景性等等。然而他们只是在研究技术的意义上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作出区分,在本体论和认识论领域他们则一直持有逻辑经验主义者所倡导的“统一科学”主张。实证主义研究者对于“科学”一词的认识是很含糊的,当自己的实证研究方法遇到困难,需要借助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二分时,他们将科学等同于“合理知识”;而当他们对不同方法论取向的社会学家展开批判的时候,他们就会先将“合理知识”等同于“科学”,再将“科学”等同于“研究技术”,强调数理方法和统计方法的元科学意义。正是基于这种模糊处理,他们才得以一方面用修辞手法来强调理论、问题背景、共识的重要性,一方面又将建构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视作“非科学”或“伪科学”的。

也正是这一点激起了其他取向的社会学家的反弹。一方面在方法论领域以修辞手法来维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二分法,一方面在认识论领域中将逻辑经验主义视为“科学”和“知识”的唯一标杆,以此批评人文取向的社会科学研究,建构主义取向的社会学家们不可能同意实证主义社会学家的这种做法。他们必然要针对逻辑经验主义的知识观展开知识论批判,而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就成为一件极为称手的武器。SSK之前的知识社会学领域出现过许多建构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理论成果,可是曼海姆和伯格等人的工作并未得到认可,原因在于他们未能深入到认识论领域中来回应实证主义社会学家的批判。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借助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对自然科学予以知识分析,这便就是一条未必能够成功但却非常合乎理性的论证道路了。正如鲁宾斯坦所言,后期维氏哲学“摧毁了”“主观主义的和客观主义的社会科学得以建立的许多二分法”,“进而使得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综成为可能”^[22]。

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虽然SSK研究常常被看作科学社会学研究的继承人,但实际上SSK对科学的研究与默顿的科学社会学来自于两个完全不同的进路,“导致SSK在科学社会学成长的主要力量,不在于它与默顿纲领可以相通的地方,而在于二者之

间相差最大甚至难以互通的东西”^[23]。它实际上继承了弗莱克、温奇和加芬克尔等人的研究传统,这和默顿科学社会学的研究精神迥异。

沿着这样的思路,我们就能更加深入地理解SSK的研究意义。许多当代社会学者笃信研究方法循规蹈矩地按照逻辑经验主义的思路开展经验研究,在误解证伪主义的同时又大规模的开展所谓证伪主义的假设检验研究。他们对真正的自然科学实践并不了解,对著名的认识论论断如“杜恒-蒯因命题”或“本体论承诺”常常一无所知。布里奇曼就曾嘲讽地说道“那些谈论科学方法最多的人往往是按照科学方法解决问题最少的人”^[24]。SSK研究者们看到了这些问题,这正是他们开展实验室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巴恩斯通过研究指出“人们常常以为,关注可否证性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所特有的一种方法论约定。然而很容易说明,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我们从考虑个体科学家或小型的工作小组入手,我们就会发现,往往不存在这种关注。而人们感兴趣的是,通过发现用于证实的事例来获得对某个理论的支持。人们从未详细说明,在什么条件下应当放弃现有的信念,而在遇到看起来强有力的否定证据时,人们往往还要维护这些信念。在许多个案中,最初以这种方式维持下来的那些信念,最终都变成了我们现在知识的一部分”^[25]。马尔凯也说道“波普尔方法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在根本上是模糊不清的……大多数科学家都致力于提供对他们假说有利的证据”^[26]。

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固执于语词与对象之间的一一对应,总试图将所有抽象语词进行物理主义还原。这种观点停留在语形学和语义学分析阶段,研究者们把塔尔斯基的真理论与自己常识中的基础主义真理观进行了搅拌式的混合。他们没有看到“语词-对象”关系的语用学特质,因此难免在社会研究中打着方法论的旗号进行一种不自知的文化霸权主义。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则清醒的看到这一点,布鲁尔说道“这里存在我们确实在运用的某种符合。这种符合并不是理论与实在的符合,而是理论与它自身的符合……从脱离实在的意义上说,它并不是内在的过程”^[27],独立的、纯粹的、描述性的观察语言是不存在的^[28],“科学观察从根本上依赖于语言……观察就是通过概念范畴而寻找事物和事件的活动”^[29]。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的观点呼应了维特根斯坦的论断“从来没有规定出准确性的唯

一理想,我们不知应该怎样来想象这种理想”^[30],“投影应当与现实相似。但是没有绝对的相似性。相似性依据投射的样式而不同”^[31]。

3 SSK 与现代西方认识论文化的根本困难

不可否认,SSK 研究中存在着不少荒唐作品,然而对于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与社会学有关的研究来说,我们很难看到实质性的反驳。布鲁尔和拉图尔等人对于阿赞德人的分析,为我们充分揭示出强纲领在理解文化现象时的力量^[32];而麦肯齐对皮尔逊相关系数及其优生学观点所做的批判讨论,也为我们揭示出自然科学与社会学互相勾连的困难,有助于人们反思统计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33]。总的来说,在目前的社会学研究中,那些真正能够回应古典问题意识并给人们带来启发的,往往正是建构主义式的讨论。然而我们又很难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或实证主义/建构主义划定一条界线,很难找到一个清晰的标准。英国数学哲学家吉利斯在细致考察了概率论与科学研究的关系后不得不承认,自然科学与社会学所适用的概率解释是不同的,可是并不存在自然科学与社会学的界线,人们面对的是一个连续的谱系^[34]。

然而科学大战的双方都不会接受吉利斯的这种立场,罗森博格说道“假设果真存在不同类型的有效知识,那么必然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他们究竟有什么共同特征才会被统称为‘知识’呢?无论如何,‘知识’一词必须有一定意义;它不能仅仅是给那些没有共性毫不相干的智力活动所加的集体标签”^[35]。此处的困境并不专属于SSK研究,它其实体现了现代西方认识论文化的根本困难。SSK研究刚好嵌入在这个历史背景中,它隶属于文化对立的一个阵营。甚至同属这一阵营的学者的观点也并不统一:哈贝马斯认为自然科学知识只是人类知识形态中的一种;现象学家凯恩认为“尽管客观科学的逻辑亚建筑超越了直观的主观生活世界,但它却只能在回溯到生活世界的明证性时,才具有它的真理性”^[19];结构主义巨匠列维·斯特劳斯特说道“每一种文明都倾向于过高地估计自己思想的客观性,而且这种倾向总会存在”^[25]。

随着当代认识论哲学的发展,社会认识论与语境论被人们逐渐重视^{[36][37]}。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形式主义顽疾,正是由于传统科学哲学过于强调语

形学和语义学,忽视了语用学的做法所导致。SSK 领域所出现的荒诞研究,恰恰因为研究者陷入了自己所批判的误区,将自然科学的表征系统与其知识效力相混淆。然而我们不能因为这些研究的出现就将 SSK 的价值全部抹杀,这种一元论的思维恰恰是维特根斯坦坚决反对的。加拿大数学家塔西奇认为,后现代思想的根源来自于布劳威尔和希尔伯特两种数学哲学的矛盾,而维特根斯坦对“直觉主义的浪漫主义”和“日常语言的形式主义”做了一番奇怪的调和,“这种摇摆不定的,维特根斯坦的分裂人格的幽灵,萦绕和渗透在大多数后现代主义思想之中”^[38]。这种幽灵深深嵌入到当代社会科学研究者的问题意识中,或许只有当“科学”和“知识”等词语的用法得到真正的澄清后,SSK 的知识价值才可能被盖棺论定。

参考文献:

- [1] Bunge M.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new sociology of science part 1 [J].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991, 21: 524 - 560.
- [2] Bunge M. *Finding Philosophy in Social Science*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2.
- [3] Feagin J R, Orum A M, Sjoberg G. A Case for the Case Study [M].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1. 270 - 273.
- [4] 斯蒂芬·科尔. 巫毒社会学: 科学社会学最近的发展 [J]. *哲学译丛* 2000 (2): 21 - 28.
- [5] 斯蒂芬·科尔. 科学的制造: 在自然界与社会之间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76.
- [6] 谢立中. 后社会学: 探索与反思 [J]. *社会学研究*, 2012 (1): 1 - 26.
- [7] 列奥·施特劳斯. 自然权利与历史 [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6. 66.
- [8] 雷蒙·阿隆. 论自由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 120 - 123.
- [9] Rorty R. Straussianism, democracy and Allan Bloom: that old - time philosophy [J]. *New Republic*, 1998, April: 28 - 33.
- [10] 高全喜. 何种政治? 谁之现代性? [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7. 45 - 58, 125 - 152.
- [11] 刘珺珺. 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传统和现状 [J]. *自然辩证法通讯*, 1989 (4): 18 - 25.
- [12] 派翠克·贝尔特. 社会科学哲学 [M]. 台北: 群学出版有限公司, 2011. XV, 205.
- [13] 涂尔干.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7 - 9.
- [14] 张庆熊. 社会科学的哲学: 实证主义、诠释学和维特根斯坦的转型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26.
- [15] 洪汉鼎. 诠释学 - 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105.
- [16] 苏国勋. 《韦伯作品集》序言 [A]. 韦伯.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4.
- [17] 黄光国. 社会科学的理路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312.
- [18] Habermas J. *Zur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M].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2. 90.
- [19] 倪梁康. 现象学及其效应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4. 369, 135.
- [20] 查尔斯·斯诺. 两种文化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4. 3 - 4.
- [21] 柯拉科夫斯基. 理性的异化——实证主义思想史 [M]. 台北: 联经事业出版公司, 1988. 205.
- [22] 鲁宾斯坦. 维特根斯坦与社会科学 [A]. 张志林, 程志敏. 多维视界中的维特根斯坦 [C].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291 - 299.
- [23] 赵万里. 科学的社会建构 -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 [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 298.
- [24] Bridgeman P W. *Reflections of a Physicist* [M].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5. 81.
- [25] 巴里·巴恩斯. 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 [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1. 66, 80.
- [26] 迈克·马尔凯. 科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184, 194.
- [27] 大卫·布鲁尔. 知识和社会意象 [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1. 57.
- [28] Hesse M. Is there an independent observation language? [A]. Colodny R G.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Scientific Theories* [C].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70. 35 - 78.
- [29] 迈克·马尔凯. 科学与知识社会学 [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1. 60.
- [30]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 [M].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1. 63.
- [31]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维特根斯坦剑桥演讲录 [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49.
- [32] 邱慧. 非理性还是不同的合理性——阿赞德人的案例 [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4 (5): 36 - 40.
- [33] MacKenzie D A. *Statistics in Britain: 1865 - 1930*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81. 153 - 182.
- [34] 唐纳德·吉利斯. 概率的哲学理论 [M].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2. 181 - 217.

(上接第 806 页)

- [35] Rosenberg A.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8. 198.
- [36] 殷杰. 论“语用学转向”及其意义[J]. 中国社会科学, 2003 (3) : 53 – 64.
- [37] 殷杰, 尤洋. 社会认识论的理论定位、研究路径和主要问题[J]. 哲学研究 2009 (4) : 103 – 109.
- [38] 弗拉第米尔·塔西奇. 后现代思想的数学根源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198.

Rethinking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ical empirical study

WU Su – ra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Harbin 150001 , China)

Abstract: Chinese social scientists have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SK) , while the discussion of philosophy researchers on SSK often keeps aloof from the empirical studies of social sciences. This on the one hand caused SSK disjoint with other areas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 on the other hand masked its real methodological meri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pirical study , modern social sciences have fallen into a trap of formalism with “semantics myth” and it is SSK researchers who pointed out this illness with their keen perception. Anti – science , multiple discovery or nihilism is not an apposite criticism to SSK , and the hardship of SSK doesn’ t pertain to itself , however it reflects the essential paradox in modern western epistemology.

Key words: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empirical study; social science